

对话:作为世界性的人性之道

□ 李晟台

内容提要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这个“全球世界性社会”里,“我们是第一代居民”。但问题在于“世界性”如何体现?事实上,自9·11以后,敌对双方的武装冲突与言辞交锋更加强化,并助长了“反恐”与“圣战”的对立,伊斯兰国近来发动的袭击就是很好的例证。该如何达成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方式,做到“平等却不同的共存”或者儒家所说的“和而不同”呢?本文通过探讨“和平”的概念,以及“对话”作为替代与他人仇恨对立的途径的伦理意涵,试图回应上述挑战。

关键词 全球化 暴力共生 和平 对话

作者李晟台,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46)

DOI:10.14167/j.zjss.2015.11.013

引言

2014年10月12日,用“百度”搜索“全球化”,共有583万条信息(同时用“谷歌香港”搜索,则有3740万条)。这个结果数量之多,显示了“我们”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人问: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问题不在于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

人类多样性的现状是全球化的关键所在。吉登斯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全球世界性社会中’(a global cosmopolitan society)的第一代”。^①但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性”?诚然,由全球化带来的危险、风险和机会,目前并不在乎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如贝克所言,“雾霾是民主的”^②,除非有人能逃离地球这艘“宇宙飞船”,否则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全球变暖的后果。就全球化已经或将要带来的困境之广度和深度的意义上讲,“我们”的确是世界性(Cosmopolitan)的。

但是究竟如何定义这些挑战,并着力解决它们?比如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由谁来定义解决的议事日程,贝克在如下的这句玩笑中暗示了他

的态度,“如果欧盟在欧盟中争取它的成员资格,一定是会被拒绝的。”^③就一起团结起来去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而言,“我们”还不够具有世界性。换言之,如果有可能,我们在变得世界性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诚然,如有些人所说,贝克在定义世界性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何时,与儒家的伦理观念不谋而合,也即“生活在一起,但各不相同”。^④在儒家的术语中,“我们”可能“同而不和”,但是有待变得“和而不同”(认可自身与对方的不同,并且和谐地相处在一起)。

就此而言,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世界之(不)可能性,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社会的政治/社会理念,而且还是捕捉全球化现实的一种方式。谁居住在全球性世界?他们共处的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一、全球化社区及其阻碍

乔治·米德(George H. Mead)在对国际性社区之公共性的富有洞察力的考察中,为我们目前的任务开辟了一条道路。他认为,若有“共同基础”,则各“民族自我”间的合作是可能的。换言之

之,任何有意义的合作都取决于这些民族自我之间能否共享一些“社会目标”,比如通过“国际法庭”或“国际联盟”来“控制各敌对社区之间互相冲突的利益”。^⑤但是米德非常清楚这一过程中的阻碍和困难,他写道“比之于先辈,现代人更容易将自己放置于那些与他有着共同生活担当的群体处境之中。”^⑥但是,米德也注意到,“这个任务……很艰巨,因为不仅包括了要打破诸如时间、空间、地方性等距离的限制,而且还要求破除已经固化的成见、习俗和我们深嵌其中的地位。”^⑦在没有电视机和因特网的时代,米德就认识到了世界性的可能性与阻碍,这更加凸显了米德式格言的重要性“要成为我们,必先成为他者。”^⑧他认识到这一挑战的内在困境“任何自我都是社会的自我,但是它局限在所在群体中,除非它发现自己进入更大的社会且必须在那里生存,否则它不会抛弃(之前的)那个自我。”^⑨

但是谁能是那个抛弃了旧的自我、生存在更大社会中的自我呢?对米德来说,“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理想或终极目标的人类社会理想,是能够形成一个世界性的人类社区。在那里,每一个个体都有一种完美的社会智力(a perfected social intelligence),也即所有的社会性含义都能在每一个个体的意识中被反映出来,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或姿势都能被他/她互动的其他个体所理解和接受。”^⑩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或姿势蕴含的意义与任何对其做出回应的个体是相同的呢?

虽然我们非常欣赏米德式的社会理想,但是仍旧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米德提出的解决方案中,是否有一个理论或实践的陷阱?“完美的社会智力”如何可能?它难道不是在预设一个到达他者心智的完美通道吗?果真如此,当社会成员拥有“一种完美的社会智力”,他们需要先“成为他者”吗?如果社会交换中任何个体的既定行为或姿势的含义在其他个体那里都是相同的,还剩下什么可以交换,更具体地说是社会性地用于交换?如果此类达成“一致”的主张是“成为他者”或“与他人心智合拍”(tuning-in with others)的预定目标,这难道不是要消除任何他人心中不能被通达的独一无二之处吗?如果确实这样,那么米德“一个世界性的人类社区”的理想岂不

是有成为“总体性”的危险?在那里,他者以及不同文化的他者性即使没有被全盘否定,也都将失去社会意义上的重要性。

无论“人类社会进步终极目标”的米德式可能性是什么,目前的人类看上去不可能在可见的未来实现这个目标。除非有人能达到“一种完美的社会智力”,否则必须面对文化的差异或文化壁垒。换言之,“所有人类个体拥有一种完美的社会智力的世界性人类社区”这种想法,除非拥有一个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点的概念,否则,所有的人类交往都必须面对这样的局限:我们对他人心智的了解都是有限的,这是人类理解他者的基础。

认识到这个基础,就有了重新阐释“成为他者”这一任务的可能。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性或局限性,也就是说,人只是人而已。上文所述之“时间、空间、地方性等距离的限制”或“我们深陷其中的固定习俗、成见”这些局限或特殊性应该被丢弃或废止吗?如果这些局限性或者特殊性被抛弃,“人类理解”还是“人类的”吗?

梅洛·庞蒂认为,“要达到世界性,我们不应该抛弃我们的特殊性,而是应该将其转化为到达他者的一种方式。”^⑪从这个角度说,人的特殊性,以及人只能是人的局限性,恰恰不应该是被抛弃的阻碍,而是开辟了使人可能“成为他者”的途径。所以,问题不在于“成为他者”何以可能,而是在于在人类的有限性中“成为他者”何以可能。

这里需要提到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对马克思的有关“世界历史”概念的批评。和辻写道“只有当各个历史国家努力通过自身的独特方式去寻求实现人类的整体性时,‘国际’连带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可能。而试图以克服国家的民族性危机之形式来实现‘国际’,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抽象的幻想而已”。^⑫而马克思认为,是民族之间交换的发展、地区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民族的交往成为常态,才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⑬换言之,当个体的存在直接与世界历史相联系,个体成为由竞争形成的世界市场所产生的“无产阶级大众”的一部分,个体之间“真正的关

联”就会实现。要注意的是,和辻与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论述了世界性。如果说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将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外或之后,和辻则认为可能性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

二、9·11 对他者的塑造: 无声的暴力和“耳聋”

按照齐美尔的说法,战争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自9·11以来,从“反恐战争”与“圣战”之间的冲突^④到最近ISIS(伊斯兰国)发布的包含斩首4名平民的录像,都包含了敌对双方中身体/物理的或修辞的暴力,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交往的例子,这种交往建立在我称之为暴力共生或暴力共识的基础之上。每一方都在将对方妖魔化或野蛮化的基础上来确定自己的合法性,此种合法性反过来为针对他人的暴虐行为提供基础。这是一个通过暴力的共生而形成并不断强化的暴力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中的“有组织犯罪”(organized perpetrators)留下了表示他们行动的宗教基础的痕迹。但是哈贝马斯指出“在他们的动机和手段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失衡。”^⑤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有宗教(伦理)的一致性,换言之,他们所声称的9·11袭击的“宗教原因”,是否与采取的手段内在一致、没有冲突。所谓的“宗教原因”能够用来为9·11袭击这样的手段辩护吗?

哈贝马斯委婉地提醒我们注意,上述失衡其实是“现代化造成恐怖分子的祖国失衡”的反映。即便同意这一说法,也即现代化如此“迅速而又彻底”,以至于“面对被侵蚀的传统生活,没有救赎之法”^⑥,恐怖分子还是要回答以下问题:即便对他们来说恐怖主义活动是保卫传统生活方式的唯一选择,用飞机作为大规模毁灭武器是否有其宗教义理依据?进而,即便对于自杀式爆炸者来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是“全球化的现代性标志”,或者“魔鬼的象征”,即便他们的攻击行为是要反击迅速而又彻底的现代化,或者如福山所言是“对现代世界的绝望抵抗”,他们的行为还是包含了一种自我矛盾^⑦:将飞机巧妙设计为炸弹的精密筹划这一行为本身,正是恐怖分子所反对的现代性的产物。

德里达以另一种表述呼应了哈贝马斯的论点:在全球化的现实中,“获利的只有一些国家和

一些国家中的特定阶层”。^⑧获利者与没有获利者之间的鸿沟,并不只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外,我们在其内部也能看到。尽管9·11袭击的有组织犯罪者本身得益于所谓的全球化(资本力量,电子通讯,先进科技,边界开放,等等),他们“却声称这次行动是为了被全球化抛弃的人……这些人被边缘化,被拒绝,被剥夺了公民权,被挤压到一边,只能接触到有限的媒介(电视在今天从来不是一种中立的工具)却同时要忍受着其他人的繁荣”。^⑨简言之,德里达提出了“代表”的问题,它似乎支撑了贯穿于9·11恐怖袭击中的合法性。

在德里达看来,9·11袭击的犯罪者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所谓的代表是合法的,是否要先攻击其国内阶层之间的分化?否则,他们的代表性只是另一种针对伊斯兰社会内部那些受排挤群体之现实的遮蔽而已。

尽管如此,除了等待相关答案以外,在这些行为所表现出的绝望感中,还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德里达认为,由于全球化继续制造着受害者,“那些口头的、和平的‘对话’现在不再发生。”全球化的受害者“不仅被剥夺了通往我们所说的民主的可能,还被富人以隐藏起双方内在不同和不平等的方式,排除在富有者(剥削者)的所谓‘合法财富’之外”。最恶劣的暴力经常被看作是对“耳聋”的唯一回应,就像曼德拉的例子,“他的政党完全被拒绝对话,于是在经过了长年的非暴力斗争之后拿起了武器。”^⑩

如报道的那样,9·11袭击没有任何口头声明。这就是针对“耳聋”的“无声的暴力”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无论如何,9·11袭击和随后的“反恐”与“圣战”之间的冲突,为暴力的共识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在暴力共生的循环中,“我们与他们的对抗”成为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这是一种强迫性选择: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他们一边。

三、全球性的挑战: 对话作为 世界性空间的架构

按照艾瑞斯·杨(Iris Marion Young)的说法,文化帝国主义是“将一个主导性群体的经历和文化普世化,并确定为标准”。在这一过程中,“主导性文化经历一个矛盾性压迫,因为他们既被刻

板印象所标识,同时又是不可见的。”^② 应该注意的是还有另一种过程,也就是贝克所说的“通过相对主义方式的原教旨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会导致这样的观念“只有生而为‘少数民族’身份的人才能了解被压迫的历史,才能达致为(去殖民化)运动赋权的正义。”^③

从9·11袭击和随后的一系列事件可见,各个“民族自我”在“控制敌对社区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方面,面临着严重困难,在这些困难中有米德所说的“共同基础”的缺席。诚然,为暴力共生所困的“反恐”与“圣战”的关系,与米德所期盼的共同努力以到达“全球人类社区”的社会性之间有极大不同。在“反恐”与“圣战”那里,根本看不到任何与他者共存的努力,更别提“成为他者”。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我不认为“敌对社区”之间“共同基础”的缺失是由于缺乏“一种完美的社会智力”。恰恰相反,需要我们追问的是“完美的社会智力”本身是否导致了目前的困境?^④ 难道不是“只有我们而非他们才拥有完美的社会智力”之类的想法导致了社区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这种思想还暗含着这样的倾向:只有“我们”而非“他们”持有“普世社会”的理想并承担实现它的重任。^⑤ 难道不是关于人类理想的这一神话般的或形而上学的垄断性声明导致了对他者的拒绝——事实上是对他者的消灭?“反恐”与“圣战”的冲突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性在今天面临的挑战,就不是一个外在于或高于差异的共同基础可能与否,而是一个存在于或贯穿于差异之中的共同性的可能(或不可能)。换句话说,共同性不是在垄断的全球性概念下排除、压迫或否认他者而获得,而是要承认彼此的不同,正是这不同构建了他者的他者性。

现在的全球形势是如何被理解和展现的呢?汉娜·阿伦特关于“国际政府”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启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对类似于“国际政府”的想法持保留态度,因为她对任何有意或无意压制政治差异的多种极权主义倾向持有批判态度。她写道“一个主权力量统治整个地球,垄断各种暴力手段,不由其他主权力量检验或控制,这样的观念不仅是禁忌的暴政梦魇,而且也是我们所知的所有政治生活的终结。”^⑥ 阿伦特认

为,任何既定的政治疆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它还必须成为“一个不同成员互相关联、交往的空间”。除非它成为“交互空间”(in-between space),否则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一块土地。^⑦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个主权力量统治整个地球,垄断各种暴力手段”的观念,会损害任何既定政治疆界的根本基础,因为它危害到他者的存在。而他者,正是“政治的”条件,是在任何既定政治边界内部或边界之外的“交互空间”。也就是说,垄断各种暴力的想法与“多元、多样和相互局限”^⑧之可能性是冲突的,而后者正是政治生活所要求和必需的。

需要强调的是,阿伦特并不反对“人类的团结”或“一个全球性同盟的政治结构”这样的观念。如果人类团结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上,而非仅仅出于对人之恶魔般能力的可以理解的恐惧心理,如果所有国家的新的普世比邻关系会导致某些更让人看到希望的东西,而不是相互仇视的大规模递增……那么一个大范围的相互理解 and 自我认识的提高必将发生。^⑨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战争的道德等价物》中写到,他从现代战争中发现,“文明的选择”过程具有“一种令人好奇的心理混合物”。与古代战争追求纯粹战利品和控制权不同,现代战争有一个“可言明的道德动机”为自身辩解,这就是把所有的邪恶都推给敌人:“英格兰和我们,我们的军队,海军当局,不停地这样说就是为了‘和平’,而德国和日本则是为了战利品和‘荣耀’”。^⑩

但是,只将战争的责任归于敌人,或者将自己的战争行为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自卫,未必能达成对和平的承诺。相反,詹姆斯写道:军人嘴里的“和平”在今天等同于“期待战争”,而且“每一部与时俱进的字典都应该写明‘和平’同‘战争’是一个意思”。事实上,“现代人从先人那里继承了好斗的天性和对荣耀的热爱。”^⑪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现代人的头脑里,“和平”不过是为下一场战争做伪装的准备,是隐藏野心所需要的借口。

那么,什么才算是名实相符的和平呢?换言之,怎样的和平才不是对下一次战争的伪装性欲求呢?阿伦特通过阐释和平与暴力的关系而切中了要点“暴力,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作为暴力

的一种形式,战争也是工具性的,需要“对它追求的目的进行合法性说明”。所以,战争的目的是“和平或胜利”。但和平的目的又是什么?阿伦特认为“没有答案,和平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和平本身“是它自己的目的”。^③

作为绝对的和平是其自身的目的。它并不遵循、而是超越了现代人头脑中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两分法。这种两分法视和平为战争的暂时手段,或者是为下一次战争而进行秘密准备的肤浅借口。只要和平仅作为一个为下次战争准备的借口,“口头的、和平的对话”的确不会发生。然而讽刺的是,对话的不可能性恰恰揭示了对话作为世界性空间(cosmopolitan space)框架的伦理潜力。首先,必须强调对话之可能性本身依赖于他者的存在,没有他者便没有对话。其次,作为对话可能性之条件的他者,不同于在帝国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压迫下被抹杀的他者,因为后者只是控制的对象而已。在这一意义上,开启对话已经并且总是对世界性人性的一种伦理承诺。因为只有对他者的世界性承认(cosmopolitan recognition),才能为他者开启空间,而不是把它置于隐藏的支配野心之下。至于伦理之诚信,为了隐藏潜身幕后的暴力动机而装作和平姿态的对话不过是自毁长城。

在此意义上,只有对暴力的任何隐藏野心保持警惕,对话才有可能。这种暴力拒绝承认不同声音在政治上的平等。在将对话作为全球性空间的架构时,应该做出这样的追问:任何既定对话是否只是消极替代暴力的冷漠选择而已?任何他者是否事实上比对手更不“可见”,不被承认其差异?^④

他者的包容性(或排他性)及其与社会、政治、历史局限相联系的伦理潜力有待解放,就这一点而言,任何既定的社会、政治边界都应当被质疑。当这些局限不再被视为既定的和固定的,而是可以被挑战和改变的,就一定意味着我们会拥有这样一个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人们呼唤“对话”以实现一种世界性的人性之道,从差异中一起学习。

注释:

①Giddens, 2000, 37.

②Beck, 2001.

③Beck, 1999, 14.

④Beck, 2001, 197.

⑤Mead, 1980, 195.

⑥⑦⑧⑨⑩Ibid., 193, 194, 122, 84, 661, 662, 663.

⑧⑨Ibid.

⑩Mead, 1934, 310. 可能有人会认为米德的“完美的社会智力”联想到康德的“扩展的精神”。要强调的是,“扩展的精神”是把人设想为一个包括所有人类的社区的一份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cf. Arendt,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140.)

⑪Merleau Ponty, 1964, 92.

⑫Watsuji, 2002, 248.

⑬Marx & Engels, 1964, 60.

⑭ISIS 发布的视频展示了对英国的人道救助者大卫·海恩斯进行斩首的画面。英国首相卡梅伦回应称,“ISIS 只是在宣扬他们的残忍,他们号称这么做是以伊斯兰的名义,这根本是胡说。伊斯兰是一种和平的宗教。ISIS 不是穆斯林,而是魔鬼。”而在海恩斯被处决前宣读的声明中,称卡梅伦对他将要遭受的死刑“负全责”,“你像你的前任布莱尔一样完全追随美国,同整个伊斯兰国家为敌,保持了英国首相没有勇气向美国说不的传统。”(《纽约时报》2014年9月13日)。而此前针对阿布·穆萨布·扎卡维处决一个美国公民的消息,乔治·布什声称卡扎维及其代表的军事集团是“野蛮而又极端的暴徒”。但卡扎维应该预料到了这种反应,毕竟,布什除了是古老的“异教徒”或“无信仰者”之外,什么也不是。

⑮Habermas, 2001

⑯Habermas, Ibid.

⑰恐怖分子可能会无视这种自相矛盾。当然,其行为的某些方面也确实可能与某些宗教原则有关,但是更详细的探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⑱Borradori, 2003, 122.

⑲Borradori, Ibid., 122-123.

⑳Young, 1990, 59.

㉑Beck, 2001, 195.

㉒据报道,伊斯兰国的恐怖行动是基于瓦哈比教派的教义,就该教派的创立者 IbnAbdal-Wahhab 而言,他的“关键想法”在于“不同意他对一神论定义的穆斯林……不是被误导的穆斯林,而是就不是伊斯兰。”(Commins, David, 2009) 美国的伊斯兰最高委员会(2014年10月14日)还指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瓦哈比教派之间的关系,称“传统伊斯兰视宗教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协定,所以是一个灵性的领域,在这个信念下,宗教并不是用强迫或暴力。从先知默罕默德(们)的时代开始,和平与包容就在不同的宗教群体中被不断实践,但是他们的信仰各有区别。与此相反,所谓‘瓦哈比’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宗教信仰的政治执行上,所以信念不再能各不相同。在‘瓦哈

比’教义中,信念未必是一种选择,它通常是外力强制所施加的”。简而言之,“瓦哈比穆斯林的追随者不是将其看作众多思想的一种,而是达到真正伊斯兰的唯一路径——别的都不行。”(Austin Cline, ABOUT.COM.) 奥萨马·本·拉登和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死于2006年美国的一次炸弹袭击)到死都带领着伊朗最激进的圣战组织。但并不是卡扎维,而是ISIS 现在的首领阿布·巴克·巴格达迪被视为本·拉登的真正继承人,因为他“更暴力,更致命,更反对美国”(David Ignatius, 10 June 2014, 华盛顿邮报)。

④有人可能会问,米德基于“一种完美的社会智力”的“世界人类社区”的理想是否能摆脱这种排他性帝国主义信念或野心。

⑤⑦Arendt, 1968, 81.

⑥Arendt, 1992, 263.

⑨James, 1967, 663.

⑩Arendt, 1970, 51.

⑫萨义德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或者社会是纯粹的一个东西。”(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587.) “使得文化或文明有趣的东西,不是它们的精华或纯洁性,而是它们的混合和多样性,它们互为逆流,即同其他文明进行引人注目的对话。”(Said,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28.) 对帝国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倾向来说,“文明认同”基于既定文化的纯洁性。不同的需要注意的声音要么是次一级的,要么就是需要被现有主权包含进去的,或者是需要让它沉默,不再发出声音。

参考文献:

1. Arendt, 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 Arendt, H. 1968. *Men In Dark Times*. San Diego: A Harvest Boo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3. Arendt, H. 1970. *On Violence*. Orlando: A Harvest Boo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4. Arendt, H. 1992.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Pengui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3 by Viking, New York.
5. Arendt, H. 2003.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Kohn, J.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6. Beck, U. 1999.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7. Beck, U. 2001. "The cosmopolita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in Tomasi, L., ed. *New Horiz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8. Borradori, G. 2003.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 with 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Commins, D. 2009. *The Wahhabi Mission and Saudi Arabia*. I. B. Tauris

10.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1. Fukuyama, F. 2002. History and September 11 in Booth, K. & Dunne, T. ed. *Worlds in Collision: 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12. Giddens, A. 2000. *Runaway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3. Habermas, J. 2001. Belief and Knowledge: A Beginning, Address on accepting the German Book Trade's Peace Prize Sueddeutsche. de 15 Oct. 2001.

14. Huntington, S.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5. James W. 1967. 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 in John J. McDermot ed.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660-671.

16. Marx, K. & Engels, F. 1964. *The German Ideolog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7. Mead, G. H. 1980.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2 by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8.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 Said E. S. 2000. *Reflections on Exi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 Said E. S. 2004.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1. Watsuji, T. 2002. "The Significance of Ethics as the Study of Man," Valdo Viglielmo and Agustin Jacinto Zavala trans. in Hwa Yol Jung ed. *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Oxford: Lexington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7.

22. Young I.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陈亚飞

ative benefits. The study builds up the GVC analysis framework , believes that the human capital is a contributing factor in domestic factor endowment transformation , while which is helpful to avoid the “wrong match” of large trade scale and small actual benefits. The study re-measures the export sophistication index to illustrate the participation into GVCs of China’s total 31 provinces , takes the methods of the conditional quintile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medium effect model to examine the composition and medium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besides , the study analyzes the microeconomic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GVCs’ escal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human capital is the critical principal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of GVCs’ escalation , and the activation of human capital is important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transformation , and can motivate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Chin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GVC) ; human capital; composition effect; medium effect

Big Data , Public Opinion Transition and Digit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41)

Wang Bo

(*School of Government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 Public opinion has undergone tripling transitions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Firstly ,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opinion transforms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centralization; Secondly , the measure of public opinion from sample data analysis to whole sample data; thirdly , the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from small data to big data analysis. Digit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rucial in system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Four tactics based on SWOT analysis: SO ,WO , ST , WT tactics have constituted essential ways to develop digit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Key words: big data; public opinion transition; digit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WOT analysis

Dialogue as Dao of Cosmopolitan Humanity (48)

Sungtae Lee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Anthony Giddens states that “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live” in “a global cosmopolitan society”. But the question remains: Cosmopolitan in what way? Isn’t it the case tha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war on terror” and “Jihad ,” since the September 11 has been , as exemplified by recent terrorist attacks by ISIS (Islam State) , rather strengthened and fueled by exchanges of physical or rhetorical violence between the antagonistic counterparts? How , if possible at all , is it possible to realize a cosmopolitan way of life as to “live together , equal yet different” or Confucian ethics of to be-with others in recognition/harmony of differences? Current essay proposes to respond these challenges by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peace and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dialogue as an alternative to antagonistic confrontation with other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pact of violence; peace; dialogue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Ban Artists Abused Drug (54)

Chu Cheng

(*Administrative Law School ,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 Xi’an 710063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restricting the labor rights of drug abusers from the bans of SARFT on drug-addicted artist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tent of public interest needs to be measured , not with general provisions , which should be reviewed by technical requirements , such as legal reservation , proportion principle , due process. These bans not only go without the principle of legal reservation in form , but the content is also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administrative right , which violated rules of injunction of The Law Against Drug Abuse and Treatment of drug addiction.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legal norm of occupational admittance or prohibition of drug users in china , it can be found that letting drug addicts completely out of their industry is not reasonable but very strict , Legal norms do not respond to artists with high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s. The bans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with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 and goes against non-retroactivity principle , lack of necessary legal relief , which bring illegal treatment for artists indirectly.

Key words: SARFT; drug-addicted artists; labor rights; restriction of right; constitutional review

Study on the Legalization of Cash Deposit in Administrative Licenses (62)

Xu Xiaoming

(*Yangzhou University , Yangzhou 225000 , China*)

Abstract: Practice of cash deposit in administrative licenses can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restoration and civil compensation on the license holders’ part. However , at present , related legal system still lacks unity , hence the methods of practice are severely divided. While cash deposit does have its positive function , it also may trigger certain risks , such as compressing license holders’ benefit space , encouraging slackness of supervision , and oversteppin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by exercise jurisdiction. To effectively legalize cash deposit in administrative licenses , we need to focus our efforts in four main issues: Firstly , as to